



经典作家之李劫人

今年是李劫人诞辰125周年,这位被忽视的中国“左拉”是现代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作家、翻译家。但他的身份不仅于此,他既担任过《川报》的编辑,又是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社的创办人;既在法国生活过四年,成为法国作品译著的先行者,又任职过解放前成都大学的教授;既为养家糊口开过小餐馆,又曾到中学以教书为生;既投资过纸厂,担任董事长,又在解放后担任过成都市的副市长。他丰富的经历和体验,为他的作品提供了丰厚的给养,为他的思想延展了宽广的边界。其中,李劫人最重要的两个身份就是作家和实业家。

1935年对于李劫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在这一年,李劫人创作完成了他的代表作“大河三部曲”《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同时,李劫人曾经投资失败的嘉乐纸厂被重新注资,起死回生,李出任董事长。以文学创作和实业救国两条主线贯穿的生命轨迹,在这一年形成一个交汇点,起承转合着过去的经历和未来的发展。本文以此为切入点,走近李劫人,缅怀这位杰出的作家和实业家。

“大河小说”展现多姿多彩的历史画卷

《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以1894年甲午战争至1911年辛亥革命之间的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借鉴法国自然主义文学史诗性长篇小说的模式和司各特历史小说的写法,各以一个典型的家庭为叙事中心,联系纷繁复杂、波谲云诡的历史人物和事件。《死水微澜》以1894年甲午战争到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为时代背景,以成都郊外一个小镇为场景,将普通人蔡大嫂、罗歪

嘴等放在历史转折关头,详细描写社会各层次的变化、反应,使主角的个人日常生活与重大历史事件联系起来,描绘了四川社会各种历史力量的冲突激荡、发展演变以及川蜀的历史风物。“死水微澜”之题是一个隐喻,晚清社会中主人公们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描绘出“安静如死水一般的古城”,在时代的风潮下激起微澜,也是中国旧社会的一个缩影。正如书中所说:“当义和团、红灯教、董福祥,攻打使馆的消息,潮到成都来时,这座古城不过清风拂过水面,微微起了一点涟漪,做官的照样做官,做生意的照样做生意,居家、行乐、吃鸦片烟的,照样居他的家,行他的乐,吃他的鸦片,各处人心依然是微澜下的死水,没有一点动向。”

《暴风雨前》是以辛丑条约签订后,展现了成都1901年至1909年之间,西方科学民主思潮不断涌入,民智渐开,改良主义的维新运动在内地勃兴,知识分子纷纷出国留学,“师夷长技”。与《死水微澜》不同,《暴风雨前》展现的是知识分子的锤炼、锻造与变化。以半官半绅的地主郝又三的家庭为核心,讲述了四川诸多新事物的产生和历史发展的新变化,包括宣扬维新思想的文明合作社的成立,申报、沪报在成都的落户,东渡日本的留学潮,川汉铁路的建造,省城第一届运动会,以及真实记录了孙中山等人的革命运动,四川郫县“打毁教堂,殴毙教民”等大案,红灯教进城,江安事件,逮捕革命党人等历史真相,预示着暴风雨必然到来。

《大波》是以保路运动为核心历史事件,叙述了其原因、发展的经过及最后导致辛亥革命爆发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由于李本人亲身参与了保路运动,因此创作时感觉“胸中奔腾不能自

李劫人:中国现代作家的独特存在

□桑 媛

已”,其刻骨铭心的切身体验、炉火纯青的写作技巧、严谨求真的史料调查,以主人公黄澜生出生于新潮的半官半绅家庭为依托,正面描写了历史事件、发展规律,将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清晰再现,将枯燥沉寂的历史档案加工成曲折跌宕的精彩故事。

郭沫若对其叙述规模和叙事技巧大加称赞:“以正确的事实为骨干,凭借着多种多样的典型人物,把过去的时代,鲜活地形象化了出来,堪称‘小说的近代史’。”纵观他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他准确真实地刻画了大小事件的地点,把人物和情节放在一个毋庸置疑的“巴蜀空间”展开,表现了历史的真实性,这就是李劫人呈现给读者的历史小说创作。《死水微澜》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现代历史小说,“大河三部曲”异曲同工,展现了现代历史小说的品格。如果说司各特是欧洲历史小说的创始者,那么李劫人便是中国历史小说向现代转化的开创者,如果说曾朴是中国现代历史小说模式的开创者,那李劫人就是中西融汇的承载者和传承者,他拓宽了历史小说的视野,使其民族化、本土化,将历史真正写成了小说。“大河三部曲”对历史的逼真勾勒,将时代潮流的涌动和冲击一一呈现,生动清晰地“反映了中国历史大转折时代”,成为一幅全面生动的清末民初历史画卷。

文化自觉书写川蜀的魅力风情

如果说书写历史事件、政治风云变幻是现代文学的必定议题,那么全景式的川蜀风俗、风情的客观呈现便是李劫人的慧眼独具和文化自觉。五四前后的四年留法生涯,让他以异域的视角重新审视了故乡,对展现故乡风土和风情产生自觉意识。中国广阔的版图、丰富多样的地理特点,造就了中国作家的创作会带有不同地域的乡土气息,有沈从文钟情的湘西世界,鲁迅的浙东“鲁镇”,叶圣陶的苏南,萧红的东北,还有就是李劫人笔下的川蜀小城成都。

四川,天府之国,四面环山,中间为盆地,长江上游,沃野千里,土地膏腴。成都西南的大都会,既有浓厚的乡土色彩,又有发达的市民文化。李劫人出生在这里,生长在这里,深深地热爱这里的土地,他没有过分陈赞颂扬,而是用客观冷静的笔触书写记录着家乡的故事、家国的苦难,像摄影师一样摄录巴蜀民俗,描摹市井百态,从独具特色的婚嫁嫁娶到日常生活起居,从大街小巷的建筑到变化万千的小吃,从盆地独有的封闭心理受到的冲击到日常生活中人们的平庸状态,体现了作家社会学家的眼光,艺术家的审美感受力与情怀。

春节时成都富丽堂皇的东大街灯会,熙熙攘攘的青羊宫花会,热热闹闹的天回镇集贸市场,草堂寺与文殊院以及成都方言的鲜香热辣与远离京城自成一格的政治环境等等,小说会在很多处不吝笔墨、洋洋洒洒地平铺直叙每一个细节,小说中的人物、场景和情节“自动携带”巴蜀的特征。

在小说中,四川方言的巧妙穿插与真实再现画龙点睛地展现了川蜀风情的非凡活力。罗歪嘴和蔡大嫂两个人暗中“勾扯”(相好),“土苕”(土气)的人,“麻筋麻骨”的深情表白,让官方的书面语言和平铺直叙的细节描写增添了生气和活力。李劫人以巴蜀文化为给养展示着独特的巴蜀民俗文化特色,成为不可替代的巴蜀风情的书写者。

李劫人在现代文学史中并不辉煌,一是因为同时期的郭沫若、巴金、沙汀业已璀璨夺目;一是因为李的作品并不丰盛,甚至略显单薄;一是因为他的身份的多重性分散了他创作精力,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的创作倾向没有迎合历史的选择,自然主义在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并没有成为广泛的社会思潮。这也就是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后三部小说迎合时代需要而进行修改的原因。他独有的冷静客观哲思让他“在艺术上保持很大独立性”。

赤诚肝胆勇闯实业救国路

实业救国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直长生不衰的社会思潮和历史实践。青年时的李劫人就已经萌生实业救国的想法,这在现代作家中并不多见。创办实业的过程,艰难坎坷,跌宕起伏。山河破碎,风雨飘摇,中国资产阶级势弱,实业救国,注定是一条艰难之路。

1935年秋末,李劫人创办的后又停产的嘉乐纸厂被一位乐山商人注资,起死回生,李被任命为董事长。这间纸厂是李在成都大学当教授期间,与其他人一起投资创办的,结果不仅没有赚到钱,还把多年的积蓄赔了进去,而且负债累累。李劫人的第一次创业,以失败而告终,但他没有放弃。此前,1933年这一年卢作孚(李的好友、实业家)力荐李担任民生机械修理厂的厂长,但是日久他与其他股东发生矛盾,1935年坚决辞职。同年,嘉乐纸厂起死回生他又做回董事长,好景不长,两年后,抗战爆发,纸厂经营艰难,他欲辞职回归创作,但是没能脱身。至1943年4月,与纸厂股东发生争执,辞去总经理一职,保留董事长的职务。抗战胜利后,解放战争期间,纸厂面临更大困难,甚至发不出工资,停业数月。但在动荡的年代,事物的发展总会发生戏剧性的转折,至

1949年年底,即12月28日,成都解放,嘉乐纸厂积压的纸被《川西日报》全数买走,工厂立刻复活。直到1950年7月李劫人当选为成都市副市长,他的董事长职务才卸任。这就是嘉乐纸厂两起两落的发展历程,是李劫人实业救国生涯的坎坷之路,也是中国志士仁人实业救国的缩影。

嘉乐纸厂将西方先进的造纸技术引进四川,满足了抗战时作为大后方的四川新闻用纸和教科书用纸的需要。经营纸厂期间,李与“文化界救亡协会”合作,捐纸支持刊物《笔阵》出版,此外,还特别设立“文化事业补助金”,救助贫困作家,为抗战胜利和文化的发展作出突出贡献。张天翼、陈白尘等客居四川的作家都受过李的救济和资助,传为佳话。李创办实业,不像普通商人一样贪图财物利益,而是怀抱鸿鹄之志,尽己所能,在国家危难之际多做一点事情,让国家更强大,以期民族走向独立。

此外,开“小雅”餐馆,当机械厂厂长,也是李涉及的经济活动,但并不是他的主业,其缘由更多的是为生活所迫,不得已以之谋生,因此创办纸厂承载了李劫人实业救国的宏伟理想,体现了李作为实业家的敢想敢做,勇于实践的行动力。这与作家以笔为枪的文学创作活动貌离神合,具有内在统一性,但是与文学创作的“纸上谈兵”相比,更具有实践意义和强大的行动力。在实践中,在平凡的生活里,在丰富的经历中,他深谙世事,细心感受身边的一切,这也是其文学作品并不是他理想国建构的基地,而是理性选择对历史和风物记载的重要原因。

结语

除却作家、实业家的身份,翻译家也是李劫人不能忽略的重要身份,他是法国文学译著的先行者,尤其在留法的四年多生涯中,大量翻译法国作品为中文,包括《包法利夫人》等经典之作。此外还有人评价李为美食家、社会活动家。任何单一身份的解读,都会产生狭隘片面之见,认识李劫人先生必须从多角度、多维度、多层次来解读,才能完整深刻地领略到李劫人独特的人生哲学。换句话说,以文学为起点,介入和研究李劫人先生是一种惯性思维,也是必经之路,但李劫人的多重身份需要人们从更丰富的角度和更宽阔的视野来研究和定位。

他用行动和实践拓宽了人生的边界,丰富了人生的内涵。尽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并没有赢得很大的关注,但是他就像一颗沉默的“黄金”,一旦被发现,其光芒四射,魅力无穷。李劫人是现代作家中的一个独特存在,值此诞辰周年之际,作文缅怀,向先生致敬。

李劫人与郭沫若笔下的袍哥形象散论

□周 文

有研究说李劫人的小说是一幅幅描写成都的风物画卷,这一说法在道出李劫人创作地域特色的同时遮蔽了小说家的野心。在初读李劫人作品时,我就隐隐感觉到作者在跟踪时代、对社会进行全景式镜头捕捉与扫描的努力,理解了作者的这一意图,才能真正品味小说中各种穿插的场景与细节描写。以《死水微澜》为例,小说通过蔡大嫂与蔡傻子、罗歪嘴、顾天成等人的感情纠葛串联起包括农民、地主、官僚、妓女、袍哥、刀客、商人、洋教徒等社会各阶层联动的时代画卷,其中部分情节之间的联系在小说内部显得较为疏远。比如,顾天成的女儿招弟被卖进郝公馆,以及在郝公馆内的种种遭遇在小说情节的推动中显得有些滞缓,作为伏笔也略显冗长,但如果将此理解为作者借以完成一种视角转换来窥探郝公馆这一个士绅阶层的生活,就能对“死水”这一意象有更加深刻的体味。小说家试图尽力呈现出社会现实的自然状态、事件发展的真实节奏和剧变的情无声息。这显然与小说情节设置环环相扣、波澜起伏、引人入胜的要求相矛盾,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作品在1930年代的接受,但随着时间或地点的推移,李劫人小说的历史价值和艺术魅力就会不断显现。研究者在陈述郭沫若对李劫人作品的褒奖时,一定不能忘记,当时的郭沫若正在异国他乡流亡,这一境遇对郭沫若走进李劫人的小说至关重要。老同学创作的“近代华阳国志”对郭沫若来说,不止是一部独特艺术作品,更是一剂解思乡之苦的良药。一部作品的接受往往与其艺术特质密切相关,所谓“李劫人难题”是由李劫人作品本身造成的,而对其作品独特的艺术发现,更是如此。

考察郭沫若与李劫人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颇为有趣的话题。在李劫人研究中经常被引用的郭沫若《中国左拉之待望》一文并未收入《郭沫若全集》,郭沫若归国以后,他与李劫人之间的交往并不频繁,尤其在抗战期间,川渝作为抗战的大后方,李、郭二位老同学并未流传更多的友谊佳话。而且,值得一提的是,李劫人短篇小说《梦痕——辛亥旧忆中的几缕》曾有这样的描写:

我笑说:“你提起了辛亥年的事,恰好我正打算把那年的变动写一个大概出来,只是材料太不够。光凭记忆,不要又弄成郭大头《反正前后》,那才糟糕呢!”

朋友甲道:“你说到《反正前后》,我好像看过一眼这本书。郭大头把二十年后的思想行动,生生的装在那时人的脑

里身上,说不定也就是他的价值所在。只是我们不懂,不懂的就不谈了……”

可见,“精公”与“郭大头”在创作上有各自的见解和价值取向。再翻阅《李劫人年谱》,李劫人的求学经历及交往细节对理解他与郭沫若之间的关系颇有参考价值。在郭沫若插考入四川高等学堂(四川大学前身)分设中学丙班,与李劫人同班时,他们的同学还有王光祈、周太玄、曾琦、蒙文通等现代名家。其中曾琦是中国青年党的创始人,“国家主义派”的代表,曾与郭沫若产生过激烈的冲突。李劫人赴法国勤工俭学,是接受李璜的邀请,而李璜正是中国青年党的另一发起人,同时李劫人的亲戚何鲁之与他一同赴法国勤工俭学,也成为了中国青年党的骨干。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李劫人与曾琦、李璜、左舜生等一起参与毛的宴请,足见李劫人与曾琦等老同学的交道不浅,远在郭沫若之上。众所周知,曾琦等“国家主义派”自法国求学期间就坚持反共立场,而郭沫若正是因此而与之走向对立的。在这样的思想与人事的复杂场域中,李劫人与郭沫若之间的同学之谊能否真正超越意识形态对立和人事纠葛是值得追问的。然而,郭沫若毕竟热情洋溢地赞扬过李劫人,而李劫人也不是所谓“国家主义者”,中国现代思想与文化的可能性和丰富性也绝非“主义之见”所能言尽。倘若我们进一步追问,让已二三十年没有破整日的功夫来读小说的郭沫若沉醉于李劫人小说之中并为之感动的究竟是什么?如果我们用心比较二人作品中饶有趣味的细节,就不难明白,尽管对时事的分析不同、思想见解迥异,但他们对社会现实的体验和感悟却是相同的。以二人对袍哥的描写为例,尽管李劫人与郭沫若家庭出身不同、教育背景不同、政治思想也有分歧,但他们对袍哥的记忆和感受却是相通的。

李劫人与郭沫若对土匪袍哥都有切身的交往感受与情感体验。李劫人的儿子刚满三岁,就被一个兵痞连长勾结丫头绑了票。李劫人辗转请托时任宪兵司令谍察的袍哥大爷卞瞎子多方说合,花费600元赎金方才解救。李劫人以卞瞎子为原型,塑造了罗歪嘴这一著名的人物形象。虽然李劫人对卞瞎子充满感激,但作为一名清醒的知识分子,李劫人清楚地知道正是混乱的世道给了江湖人更大的活动空间。这一认识在其小说中有着淋漓尽致致的表现,罗歪嘴在本地袍哥码头中做大管事,被尊称为“罗五爷”。按袍哥的规矩,“内

事不明问当家(三爷),外事不明问管事(五爷)”,在小说中,罗歪嘴并非雄霸一方的枭首,手下也就三五个死心踏地的弟兄,其主要业务也就是开赌场,做“清水袍哥”的劫财游戏等非法勾当。罗歪嘴匪气十足,但却又浑身透露着江湖人特有的义气、豪侠,虽然干着违法的事体,但却又十分尊重江湖规矩。比如,对于女色,罗歪嘴有所为又有所不为——人到中年不成家,整日混在妓院居无定所,但却又嫖之有道,不侵扰良家妇女,对于妓女刘三金也照顾有加,对蔡大嫂显露爱情之后更显示出他是个有情有义的男人。对于罗歪嘴,作者并未透露出太多的偏好或评价,而是刻意塑造了这样一个不能简单用好或坏来评判的复杂立体的人物形象。李劫人的这种写法,从创作方法上来说固然是其一贯的文学主张,但从根本上来说,还是源出于他亲身的生活体验。

与李劫人相比,郭沫若对袍哥的认知可直接追溯到其幼年时期。郭沫若家庭本身与袍哥就有着很深的渊源(郭沫若祖父绰号“金脸大王”,是当地袍哥首领),对于这一点他甚至颇为得意地在其自传开篇不久就直呼道“铜河沙湾——土匪的巢穴!”郭沫若对袍哥有着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据他回忆,还是懵懂少年时就曾自发为官方通缉要犯“杨三和尚”遮挡以帮其躲避追捕皂隶。而“杨三和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以郭家为首的客籍人的“公敌”。在郭沫若眼中,家乡的土匪“爱乡心是十分浓厚的”,在本乡十五里之内决不生事。说到家乡说到袍哥,最令郭沫若引以为豪的事情是,在郭沫若父亲贩卖鸦片烟期间,有一次挑脚在离家三十里远的地方遭了劫,没想到第二天清早打开大门时,“被抢劫去了的云土原封原样的陈列在门次的柜台上”,还附有一张字条这样写道:

得罪了。动手时疑是外来的客商,入手后查出一封信才知道此物的主人。谨将原物归还原主。惊扰了,恕罪。

郭沫若与小伙伴自发搭救“杨三和尚”,“杨三和尚”又是冒着生命危险劫囚车解救另一位土匪首领“徐大汉子”,为此甚至杀死了一名把总,闯下了滔天大祸,这在郭沫若看来都是值得赞颂的侠义之举。这种对土匪袍哥的认知和价值取向在李劫人的小说中也得到了精彩的呈现。在《死水微澜》中,作者通过罗歪嘴之口,讲述了“声光及全省”的袍哥能把子余树南余大爷的故事。

余树南“十五岁就敢在省城大街,提刀给人报仇,把左手大拇指砍断。十八岁就当文武会的舵把子”,为了解救一个失手杀人做“浑水生意”的袍哥兄弟王立堂,余树南不动声色寻觅可用之人李老九,又不紧不慢等时机一到便熟练地做起“掉包”换人把戏,然后到处通气,打通官府,直到逼迫被害人马家放弃追究。整个故事是在罗歪嘴摆龙门阵的激昂中讲述的,因此字里行间都透露着褒扬,仿佛余树南是举世罕见的大英雄。然而,细细思量,所谓江湖道义只是对袍哥兄弟,对于他人尤其是普通百姓来说,要么如李老九那样有利用价值,被选中做出牺牲,赢得袍哥的认可与余大爷的照拂;那么便如马家人那样,家人被杀,凶手虽然被擒,却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逍遥法外而无能为力。江湖的规矩、袍哥世界就是这样赤裸裸的没有遮挡,真实的让人感到沮丧。然而,正是这种真实不仅展现并保存了一个时代的人文风貌,更赋予了小说特有的艺术魅力。

以李劫人和郭沫若为代表的四川现代作家对袍哥的描写和记忆,使得四川袍哥成为了现代中国帮会组织中一个独特存在。与洪帮等其他现代著名帮会一样,四川袍哥也是晚清革命党所借重的社会力量之一,长期活跃于民国政局中的四川政坛。李劫人与郭沫若对袍哥的特殊感情正是基于他们同学时期四川政治的特殊经历。郭沫若的特殊性在于他既是袍哥力量增长的受益者,也是叛逆者,尤其是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郭沫若尝试着完成一种自我的超越,然而人的感情是无法简单用思想超越的,郭沫若虽有意但未能“把二十年后的思想行动生生的装在那时人的脑子里身上”,他试图将土匪袍哥的特殊感情转化为革命者的豪情,尤其是随着社会语境的变化,“主义”在文学淡出之后,借助李劫人小说的还原和互读,我们仍能感受到这一原初的情感动力,而这恐怕也是李劫人小说的特殊价值所在吧。有不少的研究者当前仍在感叹李劫人小说的价值被低估,但在阐释言说的过程中却往往又找不准扩展的基点,仿佛是在自说自话,如果局限于李劫人本身,未能与现代文学已有研究构成对话或碰撞,文学史价值的判断便难以被大多数人接受,尤其是未能精读李劫人作品的人。李劫人的思想和创作,在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场域中有着极大的特殊性,从政治家到社会底层,李劫人都有深入的接触,这在他的思想和作品中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我们如果要想真正发掘和阐释李劫人作品的特殊价值,便不能在文化、思想乃至政局等问题上不顾而言他,便不肯与同时代的作家,尤其是与李劫人有交集的作家做比较的文本细读,只有这样李劫人作品中生动的社会百态才能丰富多彩与意味深长。

本专刊与中国现代文学馆合作